

文艺工作座谈会召开十周年

在时代的深度和广度中生成创造性力量

——新时代中篇小说观察

□ 聂 梦

2014年10月15日,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文艺工作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为新时代文艺发展举旗定向。十年来,广大作家和文学工作者在讲话精神指引下,勇担新的文化使命,于人民的伟大创造中实践杰出的艺术创造。以中篇小说为样本,可以清晰地看到,新时代文学正在以一系列代表性作品、标志性现象和时代性特征,构筑新时代文艺的独特景观,彰显新时代中国的文化力量。

弘扬家国正声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光辉历程,一方面为广大作家扎根大地、淬炼经典提供源源不绝的精神动能,另一方面也呼唤更多对重大时间节点、重大历史事件、重大题材提供深广文学观照的家国正声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文艺的作用不可替代,文艺工作者大有可为。”十年来,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0周年、改革开放40周年、新中国成立70周年、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5周年、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等重大时间节点,以党史、军史、国史为素材和题材的优秀作品不断涌现。徐贵祥《鲜花岭上鲜花开》驻扎大别山,以鲜活的英雄形象、英雄情结和英雄史事源流考,向沉睡在历史深处的英雄致以深切问候。杨怡芬《里斯本丸》从多年后的纪念活动起笔,多视角审视太平洋战争时期的海难,彰显历史正义和对和平的守护与期许。王松《红骆驼》向新中国第一代核工业者致敬,以对祖国“清澈的爱”树起一代人“奋斗青春,无悔抉择”的精神丰碑。王凯《荒野步枪手》聚焦军事演习,以饱满明快的语调描述新时代强军故事和军旅生活风景,称颂可亲可敬的基层官兵。西元《徒步走到终点》在常态和艰险双重境遇中,贴近戍边军人的心绪,书写家国意志和崇高信仰的深沉力量。小白在《封锁》中用周详广博的细节考据、重重镜像的风俗还原,让抗战时期的上海在沦陷与封锁的暗处迸发出民族大义的壮丽光芒。董夏青青《冻土观测段》递交了一份青年作家眼中的和平年代军事斗争素描。

家国正声是国之大家对新时代文艺气象的必然要求,也是对新时代文学的郑重嘱托。它激励广大作家眼纳千江水、胸纳百万兵,以正确的历史观、民族观、国家观、文化观锤炼文学的视野和格局,以庄严、崇高、宏阔的艺术表达承载爱国情怀、民族精神和英雄礼赞,以吾土吾民、人间正道的浩然之气和民族尊严不可侵犯、世界和平不容践踏的正义之声,构筑新时代文学的筋骨和脊梁。

家国正声还包含着那些被称颂和铭记的属于文学的荣光时刻——2018年12月18日,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大会上,“‘改革文学’作家的代表”蒋子龙、“鼓舞亿万农村青年投身改革开放的优秀作家”路遥被授予“改革先锋”称号;2019年9月29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勋章和国家荣誉称号颁授仪式上,习近平总书记为“人民艺术家”王蒙颁授勋章奖章;在从事文学创作70周年系列活动中,王蒙作为当代文学乃至文化重要代表,其杰出成就和深刻影响赢得无数礼赞,新时代十年创作的十余个中篇,也成为他生命伟力、人间大爱以及丰沛创造调性的有力证明。感应时代精神、体现时代高度的文学大家,由他们所发起的领唱,本身亦是正声。

把握时代进程

新时代文学作为新时代的重要文化实践,其生命活力,就在于以强劲的时代脉动、火热的现实生活、生动的人民创造为深厚基础,于时代之中、中国之进、人民之呼中,书写山乡巨变,攀登文学高峰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文艺是时代前进的号角,最能代表一个时代的

风貌,最能引领一个时代的风气。”在脱贫攻坚、乡村振兴、全面小康的第一现场,活跃着新时代作家潜心深入、孜孜以求的身影。艾平《包·哈斯三回科右中旗》以草原上最出色的牧马人三次回乡为线,让新时代故乡和人们生活方式的新变化,结实实实生长在草原丰美水草、醇厚民风以及天地人的交流互通之上。杨遥《父亲和我的时代》写脱贫攻坚中的父辈新曲,时代深处生长出的活力与不接地气的“隐疾”并存对照,儿子进步、老人犹疑的人物关系模型也就此被刷新。苏二花《在拉大锯,扯大锯》中蒸腾起雁门关外返乡后充满生机的“纯天然绿色”新生活。

此外,在家族叙事、城镇变革、都市生活、世界图景等领域,新时代文学同样多有掘进,累积着艺术探索的新成果。邵丽《黄河故事》翻涌两辈人波澜起伏的命运,映照出中国社会数十年间家庭伦理、情感结构和社会观念的变迁。石一枫《世间已无陈金芳》融现实主义品格、抒情精神和青春理想于一体,在具有典型意义的人物性格命运中浓缩社会生活特定形态,展现人的道德困境和精神坚守。林森在“心海三部曲”《海里岸上》《唯水年轻》《心海图》中寻绎海洋叙事与家族、伦理、时代、历史等坐标系的呼应,常与变,出走与归来,顺应或对抗自然及时间,都被吞没在潮汐的奔涌里,由此,写作也得以从心海走向心灵的深海。黄立宇《制琴师》借助陈腐乖张的木匠形象,传递了特定时代县城青年生命的困顿与希望,同时将整个时代向外部长望的渴求描绘得意味深长。杨少衡《铜离子》、洪放《追风》写城市建设、生态保护、科技兴业中的为官为民、家国情怀和理想担当。荆永鸣《较量》、常小琥《长夜行》里的医者仁心、众志成城、同舟共济,令人动容与敬仰。王威廉《你的目光》以“家族寻根”为叙事动力,以“眼镜”设计为纽带,书写了客家人和疍家人的历史渊源和生存境遇。王占黑《小花旦的故事》以方言入文,从个人生活史到少数族群生存状况,再到城市的变化变迁,为城市景观中落后但蓬勃的部分扩容。周嘉宁通过《基本美》记录大陆小城青年和香港青年之间的友谊,探讨重要历史时段如何与青年的日常生活、精神生活建立联系。杨方将两个大陆板块看似分离又不断断裂的情感,安置在《澳大利亚舅舅》几十年的光阴中,时代变迁、时光流逝投射其中。

文艺工作座谈会以来的十年,是新时代文学现实题材创作丰收的十年。作家们以敏锐的艺术感知力深入现实内部与细部,在时代的深度和广度中生成无尽的创造力。我们有理由相信,更多具有新时代情境气象、精神气韵、人物气质的现实题材力作正在走来。

在人民中实现艺术创造

作家们能否写出传得开、留得住的优秀作品,从根本上取决于能否为人民抒写、为人民抒情、为人民抒怀,在人民中实现艺术创造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文艺工作者要想有成就,就必须自觉与人民同呼吸、共命运、心连心,欢乐着人民的欢乐,忧患着人民的忧患,做人民的孺子牛。”人民,作为新时代文学的关键词,在作家笔下得到了深刻熨帖的呈现。尹学芸《李海叔叔》真实恳切、情深意长,两个家庭二十多年的交集缠绕,在形式技巧匿名的状态里牵动起人们的记忆、经验和情感。艾伟《过往》从代际关系的角度试炼人性,以独有的故事张力诠释美德和宽恕的力量。田耳《一天》以死亡为契机,将人物连同他们的命运召集、容纳进特定的时空容器里。刘建东在《阅读与欣赏》的工厂生活中,贡献了一位文学长廊里少有的风姿绰约、行为大胆的女性师傅形象。张楚在《过香河》里创造别具一格的剪辫关系,是对过于强盛的日常生活的飞升。鲁敏以临终拜访为主题结构《无主题拜访》,浩茫的心事无一落实,却又在不圆满处得见圆满。叶弥《是谁在深夜里讲童话》、陈仓《再见白素贞》于现代童话和传说中倾注慷慨与虔诚,铺陈与人相拥的善和暖。裘山山《我需要和你谈

谈》、程青《父亲的深夜》、马金莲《蒜》关注暮年叙事,面对代际间或焦灼或汹涌的情感,抽丝剥茧。蔡东通过《来访者》的心理治疗提示我们,对于戏剧性之后升起的日常之物,以及人的不健全与自省,谁都无法真理在握。孙频在《皎在水中央》中处理创痛,用情感的素朴与温热,营造出相对安全的暗处,企盼居于其中的人走向愈合。在胡学文《丛林》、许春樵《麦子熟了》、东君《上海为什么没有山》、弋铎《秋千引》里,平运强有力地阐述自身;在双雪涛《平原上的摩西》、班宇《双河》、韩松落《给雷米杨的情歌》、陈再见《旁观害羞者》、杜梨《今日痛饮庆功酒》里,年轻且敏锐的才情得到充分彰显。

文学的常温,在于在历史的承续处和时代的更新处看到人,从蕴含在具体生活中的理想、劳动、境界、趣味和共同的价值追求中,提取整全的人的心灵。那些以人为本的优秀作品之所以令人念念不忘,就是因为“事业和生活、顺境和逆境、梦想和期望、爱和恨、存在和死亡,人类生活的一切方面”,都能够在其中被洞察并洞见。

承续优秀文化传统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精神命脉,博大精深的中华文明是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识,新时代文学的根基和宝藏正在于此,十年间,传承中华美学精神、赓续中华文脉,成为越来越多的作家的自觉追求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们要结合新的时代条件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和弘扬中华美学精神”,“以古人之规矩,开自己之生面”,实现中华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新时代以来,传承中华美学精神、赓续中华文脉,成为越来越多的作家的自觉追求。挖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思想观念、人文精神、道德规范,把艺术创造力和中华文化价值融合起来,把中华美学精神和当代审美追求结合起来,优秀作品不断涌现。迟子建在《碾玉的车轮》中钩沉东北历史,小说以乐章的形式集结,古与今、现实与世情、历史与文在迷雾般的人物命运中次第展开,借由甲骨文物碎片的遭遇,作者完成了对中华悠久历史文化的深情回望。肖江虹《礁面》在归来的游子 and 最后的礁面师之间展开“变”与“不变”的对话,小说中一切机缘巧合都笼罩在对神、对信仰、对漫长的人类经验的敬畏里,将它同一般意义上的民俗书写区分开来,获得了独立的精神空间。葛亮在“匠人”系列《书匠》《飞发》《瓦猫》,对饱含传统文化光晕的器物和手艺,以及灌注其中的生命遭际和文化情感进行持续书写,在完成文学地理学意义上的开掘的同时,也传递了与当代审美追求同声相应的古典文脉、风格与精神。再正万以《鲤鱼巷》《指月街》《醒狮路》等为代表的贵阳系列,建构着写作者新的写作地标,也展现着一座城的文化氛围,可以以“情书”的方式烙印在文字里。普玄在《太阳刻度》中交付足够的耐心和诚恳,描述看似“前现代”的守信方式和道德准则,在遭遇“现代”生存智慧时,如何被磨损却依旧刻画在人的心里。陈集益《大地上的声音》起笔地方剧种,描摹地方性文化与时事命运的审美综合。孙正连《江水炖江鱼的日子》以“活传统”与“后继人”的父子关系,再现北方渔家文化的风俗画卷。林筱聆《故香》在150多年的时间跨度里,以世界视角讲述茶的历史与传奇,茶的哲学及文化,写茶人茶事,亦是对传统文化和家国想象的诗性演绎。龚万莹自诩“鼓浪屿小孩”,《出山》在成长小说、新南方写作、岛屿叙事、闽南风情画等条目外,自有为壮观热闹的生命哲学所滋养的光泽与韵律。舒飞廉《团圆酒》写乡村一场迟来的婚宴,小说中的人与万事万物始终并存,那些品质、造化跟前程也因团圆的篝火而被一一点点亮,作品的自在与自足指向传统审美范式的文化魅性。

可以看到,新时代文学的丰盈质地,植根于中华民族几千年代代相传

生生不息的文化坚守与精神追求,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继承发展、创新创造的奥义,也将在新时代文学的书写中得到持续的审美的验证与升华。

绘就人类文明新篇章

古典与现代、科学观与人文观、想象力与使命责任并行,科学精神、技术支撑在美学层面上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相互交融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文艺工作者要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阐发中国精神、展现中国风貌。”新时代文学是坚定文化自信、光大中国气派中国风范的文学,也是参与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体现广大人类关怀的文学。

集天地生趣,与万物共生,是中国精神的精妙所在,也是中国智慧和国经验参与构建人类共同价值的重要内涵。这当中既包括对生命原力的追溯,也包括在天地人的多维结构中恢弘心境,寻求人文与自然的融通。《三只虫草》《蘑菇圈》是阿来“从青藏高原上出产的,被今天的消费社会强烈需求的物产入手的小说”。小说的人物来自朴素的诗歌时代、手工劳作的时代、灵魂眼睛和身体相互协调的时代,来自时间无限充裕、智慧可以予人忠告、讲故事的口口相传的经验孕育其中的时代。在与消费社会的碰撞交锋中,人的神性、“齐物”的智识之境以及面向未来的强大力量横亘其间,深情召唤人们重新开始、再度出发,与世界相亲相爱。张炜《寻找鱼王》将出门远游、拜师学艺的情境处理得灵动活泼、富有深意,让时间和自然当中指引人生的恒常之理一代又一代传承。罗伟章《声音史》中,主人公小如草莽却天赋异禀,耳朵无限延展,能将万物的声音收纳于内,再在嘴唇上开花结果。在他的讲述中,世事更迭与古老神秘的历史以合于天地的状态形成呼应。索南才让《荒原上》构建了富有原初生命活力和原始诗性的生存空间,在那里,生灵万物和山川河流坚韧,广袤无垠的大地与人的渺小并置,精神游牧者行走期间,自由吟唱。

近年来,科技与科幻在文学领域声势渐长。科幻文学是大国文学、生命文学,也是集现实主义、浪漫主义、现代主义等于一身的探索人类文明存续拓展的审美共同体。在中国科幻发生、发展、崛起的过程中,科幻文学作家用幻想、更用思想,有力参与了中国文学现代化进程中新的观念和新的时空的塑造与创造。新时代以来,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科技强国、文化强国的时代命题,让科幻文学恰逢其时汇入中国式现代化的精神洪流,陈楸帆、李宏伟、宝树、树婧波、江波、张冉、阿缺、顾适、昼温等一批作家以迭出的精品力作,向世界展示着中国科幻的智识与审美担当。

现实题材领域中,科技题材小说的出现与累积,尤其值得关注,并正在形成新时代文学独有的科技风景。《中关村东隅》聚焦国产芯片创业史,作者秦北凭借十余年半导体行业从业经验,讲述了“中国芯”坎坷波澜的研发之路。陈谦在《无穹境》中用3D成像的技术难题,隐喻现代科技背景下人类看与被看的存在主义难局。吴昊宇《幻象》史迹无缝对接,知识之核在精神与美的涸染下化为文学图景。在彭杨《故事星球》里,年轻的科技公司创业者高呼“中国在长高”,也道出了向世界敞开胸襟的文化自信与自豪。在这些作品中,古典与现代、科学观与人文观、想象力与使命责任并行,科学精神、技术支撑在美学层面上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相互交融。

优秀作品不胜枚举,新时代文学向高峰砥砺前行、锐意进取,有赖于文学场域内外乃至新时代中国和整个中华民族乃至世界各国的期待和珍惜。期待未来,识微见远、丰沛开阔的新时代文学叙事,在新的文化情境中发挥应有的精神力量。

(作者系中国作家协会创作研究部发展研究处处长、副研究员)

历史地看,但凡马克思主义发挥深远正面效应的地方,都是它同当时、当地具体语境完美结合的地方,这种成功实践,既表现为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的结合(即“第一个结合”),也表现为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结合(即“第二个结合”)。可以说,“第二个结合”是“第一个结合”的深化与发展,“第一个结合”是“第二个结合”的前提与保证,两者相辅相成,缺一不可。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中国共产党人深刻认识到,只有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坚持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才能正确回答时代和实践提出的重大问题,才能始终保持马克思主义的蓬勃生机和旺盛活力。”在新的时代,我们建立中国文化的主体性就必须深刻领会“第二个结合”的“中国叙事”价值。

“第二个结合”的提出,是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结晶。中国式现代化是一项系统的工程,“第二个结合”作为其重要的组成部分,既具有中国文化主体性建设的实践意义,也具有理论上的创新价值。作为实践和具体历史进程的“第二个结合”,可分别上溯至20世纪40年代延安时期对“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的追求,和80年代中期的“文化热”思潮。毫无疑问,这两个时段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同马列主义基本原理相趋近的重要年代。那时的中国共产党人深入思考中国文化与世界文化的关系问题,思考中国文化的传统因素在“新的人民的时代”的传承发展问题,从而开启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马克思主义化的探索进程。“第二个结合”的提出,既是这一历史进程深入展开的体现,也是理论思考深入拓展的结晶,体现了中国文化主体意识的高度自觉性,具有理论创新的价值。

“第二个结合”的提出,是对以往中西二元论命题的扬弃。以往的中西关系命题,是一种典型的非此即彼的二元论命题,常常使我们感受到取舍的困难与困惑,“第二个结合”的提出,表达了建构新的“文化共同体”的尝试,是对传统二元论思维模式的扬弃。它不是片面地强调马克思主义,而是聚焦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文化取向。作为一个完整的思想体系,文化在马克思主义中占有重要位置,它由经济基础所决定,又反作用于经济基础。同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在政治经济上的生动实践,也提出了文化上的相应要求,“第二个结合”的提出正是这一要求的体现。“第二个结合”呼吁复兴传统文化中的当代价值和人民性内涵,是与包容、互信和平等联系在一起的,因而能够在同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结合中大放异彩。

“第二个结合”的提出恰逢中国共产党诞生百年之际,这是“第二个一百年”的关键节点,也是中华传统文化重新焕发新机并产生越来越大的影响力的新时代。随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深入展开,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关系命题日益凸显,“第二个结合”的提出适应了这一历史要求,具有“中国叙事”的独特价值。

“第二个结合”的“中国叙事”价值,首先体现为站在中国的角度,以适合中国的话语体系阐释中华传统文化。这与直接借用西方话语来阐释中国传统文化的这种做法明显不同。以往对传统文化的认识,主要建立在西方话语和范畴的基础上,我们在这种认知中所能见到的,只是西方文化的“倒影”和对西方文化的靠拢。要想建立中华传统文化的主体性,必须建立适合中国的话语体系,“第二个结合”的提出,为中华传统文化主体性的建构提供了依据与方向。这就要求我们,要从具体问题出发,而非从概念出发;要从具体语境出发,而非从超越历史的抽象原理出发;要面向未来,而非回到过去。这就要求我们,既要重构传统文化的当代合法性,也要建构具有“中国式现代化”内涵的社会主义文化传统。

“第二个结合”的“中国叙事”价值,还体现在对传统文化人民性内涵的重新确认与当代建构上。习近平总书记曾指出:“社会主义文艺,从本质上讲,就是人民的文艺。”可以说,人民性是马克思主义的精髓与核心所在。“第二个结合”的提出,为重建传统文化的人民性内涵提供了思想基础和路径保障:我们要建立“以人民为中心”(即“为人民抒写、为人民抒情、为人民抒怀”)的指向,并最终接受人民考验的人民文艺。这样的文艺,不仅具有特定时代的独特性,也具有超越具体时代的普遍性,能够将当下的优秀文艺纳入进来,共同汇聚成为“人民文艺的大传统”。

“第二个结合”的“中国叙事”价值,还体现在民族精神的历史重构和当代阐释上。通常认为,民族精神是国民性命题的重要体现。然而在中国,国民性命题与“五四”以来的文化启蒙联系在一起,其提出之初偏向于对“劣根性”的强调,结果导致长期以来,国民性与“劣根性”之间几乎画上了等号,国民性命题受到了严重的误解,并以窄化片面的形式呈现。历史地看,针对国民劣根性的反思与批判,对认识与改造传统中国自有其不可磨灭的社会价值,但随着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和“中国式现代化”进程的推进,中国人民的素质有了极大的提高,民族精神也具有了新的内涵。“第二个结合”的提出,为我们重新阐释国民性命题和民族精神提供了思考路径,指向中华传统优秀文化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内涵,是人性命题与中国叙事的辩证结合。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我们必须坚定历史自信、文化自信,坚持古为今用、推陈出新,把马克思主义思想精髓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华贯通起来、同人民群众日用而不觉的共同价值观念融通起来,不断赋予科学理论鲜明的中国特色,不断夯实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历史基础和群众基础,让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牢牢扎根。”可以说,马克思主义扎根中国并发挥深远影响的过程,就是“第二个结合”的“中国叙事”价值逐渐显现和凸显的过程。它的提出,既使得传统文化的新定义与当代阐释成为可能,又意味着中国与世界关系的重新叙述;既是崭新思维方式的体现,又是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未来视角;既是从中国立场出发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倡导,又是“中国叙事”的新时代呈现。中华文明的伟大复兴呼唤新的“中国叙事”的出现。

(作者徐勇系厦门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教授、郭良干系厦门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硕士研究生)

『第二个结合』的『中国叙事』价值

□ 徐勇 郭良干